

■周三有约

文·本报记者 滕继濮

何忠杰:为了“十分钟”的奇迹

“学会一些急救方法,不仅可以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自救,更能挽救他人生命。”雾霾笼罩下的北京市玉渊潭公园内,何忠杰不断向驻足的人解释着。

10月10日,是第五个“急救白金十分钟——全国自救互救日”。

这一天,在全国31个省108个城市,共有200多个医疗机构、红十字会、救援组织等共同发起,与各属地及媒体等超过300多家单位共同参与了这一公益活动。今年活动主题是“做自己的急救医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发放科普宣传彩页12万份、文化衫800件、科普问卷及图书等2万份。

何忠杰,“急救白金理论”的创始人。作为现任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重症中心ICU主任,他见证了太多生离死别,“最让人遗憾的是错过了救人的最佳时机,而导致的死亡。”

“治病救人医生的天职,是医院的本职,这句话在多数情况下是对的。”何忠杰说,可一

旦出现紧急情况,尤其是医务工作者又不能及时赶到现场时,身边人如能及时有效地开展自救互救,就能为专业医疗救助打下坚实基础,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伤残、死亡的发生。

据统计,意外发生后的前10分钟,在医护人员到达前,患者的死亡率高达50%以上。把握住这宝贵的10分钟,就可以为患者争取更多生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何忠杰用“白金”来命名这宝贵的10分钟,“急救白金十分钟”的理论基础是由急救空白时间、创伤流行病学、急救死亡流行病学、急救链的再认识、急救时效性规律等组成。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老山自行车场馆发生了南非教练里昂呼吸心跳停止事件。何忠杰第一个冲到现场,实施并指挥了医疗现场及转运工作,成功现场恢复了里昂的心跳和呼吸,为成功抢救起到关键作用,创造了奥运医疗保障奇迹。

“急救白金十分钟”其实是何忠杰的一个

“副业”,他坦承自己由于忙于日常工作,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投入其推广。从第一年到现在,“急救白金十分钟”的推广,全是靠学术交流等活动中的朋友等,大家一起凭兴趣和身为医生的责任感做起来。

长期从事急危重症领域临床工作的何忠杰,爱琢磨,爱钻研。他提出了“创伤小组管理原则”、“急救的时效性”、“急救时效值”等急危重症救治观点,倡导“急诊—ICU一体化”模式,还总结出有呼吸阶梯管理、8部位16点静脉通路建立技术,并研制了骨髓输液枪、便携式环甲膜穿刺针等急救器械。

但最让何忠杰高兴的是白金十分钟逐步获得的认可。“急救白金十分钟——全国自救互救日”公益科普宣传活动历经五届,“初见成效,初具规模”何忠杰告诉记者,北京作为活动的起源和中心,北京站活动得到政府科普立项,获得政府、学会科普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等强大政治支持,活动已被逐步培育成北京市的急救科普平



台,其它各地区虽不及北京站系统、完善,“但无论哪种都各具特色,为该活动的发展奉献了一份力量,形成了一种文化”。

■人物点击

芬兰总理:苹果公司把我们害惨了



芬兰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芬兰经济最近遭遇两次沉重打击,而这均与苹果公司有关。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上周五将芬兰主权信用评级由之前的AAA下调一级至AA+,主要因为经济发展缓慢所致。同时,标准普尔还将芬兰的经济前景展望从“稳定”调低至“消极”。在过去的三年间,芬兰的GDP一直处于下滑趋势。

对此,斯图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与苹果公司脱不了关系。他说:“听起来可能有点古怪,我想可能有人会说,iPhone扼杀了诺基亚,iPad淘汰了芬兰造纸商。但是,我们还会反弹。”

斯图布进一步解释说,芬兰最近遭遇两次经济打击,首先是诺基亚的落幕,其次是芬兰造纸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苹果和Android设备厂商的激烈竞争,诺基亚已被迫将手机业务出售给微软。今年4月,这笔交易正式完成。同样,由于消费者从传统的印刷媒体转向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设备,芬兰的造纸行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龚宇:电影院一定会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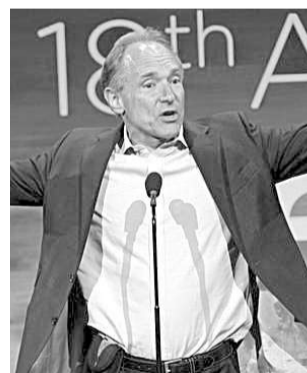


10月11日,“传承中国C4论坛暨2014年会”在北京举行。爱奇艺首席执行官龚宇做了演讲。

他讲到,航班普及和WiFi是一个趋势,如果这样,航班上就可以随时打电话随时回邮件。他更惊人地提出,电影院一定会消失,至少是现在这种形态的电影院一定会消失,电影院的一个职能是视觉听觉效果好,但人类技术会实现不用去影院就能达到的视听效果。

“电影院一定会被消灭,电视也一定会被消灭,因为他们都是顺序播放的,受时间的限制。而人的本质是要自由的,不需要规律的时间和地点来看视频。电影电视会被新出现的视频形式所取代。”龚宇强调,爱奇艺比别人晚了四五年的时间成长起来,现在超过其他行业的竞争对手,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砸钱,“该砸钱的时候千万别手软。”

万维网之父:关联广告绝非未来发展方向



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爵士上周应邀出席了伦敦IPEXpo Europe大会并发表演讲,他追忆了互联网25年来的发展史,并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

首先他指出,自己并不因为在最初版本的网络中加入更多安全机制而感到后悔。他说:“如果一开始就太困难的话,它可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

与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其他企业不一样,他担心如果互联网一开始做得太复杂,可能根本就不会有人接受和使用它,那样它可能连发展的机会都没有。

他随后谈到,提高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对互联网来说很有必要。他说:“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个人隐私已经荡然无存了;我倒认为这种说法很不靠谱。我们必须建立起能够保护个人隐私的系统,人们有权看清他们的数据将被如何使用。”

他以个人病例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说,个人病例应该能够让医生和亲人看到,但是肯定不应该让保险公司看到。他说:“我们应该建造这样一个世界,人们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数据并自行决定将数据卖给谁。用户们拥有个人数据的控制权、访问权和所有权。”

他希望,提供个人数据访问通道的机制可以促成“富数据”而非“大数据”的结果。前者对用户本人以及获准使用它的人很有价值,而后者则是他非常厌恶的一个词。

他说:“当你在杂志上看到有关大数据的文章时,文章谈论的可能是在大公司正在通过何种方式偷窥你。很多大数据对我都是威胁。这些人会如何使用那些数据?他们打算向你发送令你反感的关联广告,关联广告绝非未来的发展方向。”

伯纳斯·李称:“那些公司掌握的关于你的数据对它们而言的价值并不像对你自己而言的价值那么高。假如我拥有将近一年的Moves(Facebook的一款地理位置追踪应用)数据,那么我就能够看清我的健身活动是如何变化的。总的来说,如果你把所有数据都集合在一起,你就能够在电脑上得到自己的生活历程,你也可以使用它们。那种信息对我比白云重要得多。”

周忠和:古鸟类化石的当代伯乐



与“石”俱进论古今——古生物学工作者的坚守与信仰,想了解周忠和院士的更多访谈内容,可扫二维码进入网页浏览



文·本报记者 房琳琳

韩愈在《马说》中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若把“千里马”换成“古鸟类”,然后用在中国著名古生物专家周忠和身上,恐怕再恰当不过了。

周忠和,因为1990年的一次独自探访,让辽西热河古生物群及至整个世界的古生物化石谱系上,又增添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古生物进化脉络的里程碑——白垩纪早期地层中最完整的古鸟类化石。

当时的周忠和没有想到,在化石中默默寻觅生命遗迹的科研工作,会在若干年后带给他、以及他的中国同行如此高的世界级荣誉和责任:

45岁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同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46

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入选2012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首席科学家,并被推荐至“万人计划”,入选2013年国家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他带领团队在《自然》《科学》上发表50多篇学术论文,有关成果多次入选美国《发现》杂志年度百项科学新闻、《时代周刊》年度世界十大科技发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成果、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美国著名古鸟类学家Alan Feduccia曾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撰文评价周忠和的发现带动了随后发生的鸟类进化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突破。

……

同事们又在同一地点发掘采集到共计20余个鸟类化石个体。这些化石后来被分别命名为几种不同类型的古鸟:燕都华夏鸟、郑氏波罗赤鸟、北山朝阳鸟和始华夏鸟等,周忠和称这一鸟群为“华夏鸟群”。

教材和书本上的知识,尽管都是前人探索的智慧成果,但固步自封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周忠和说:“中国有最好的化石资源,我们又赶上了好时候。但要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除了扎实的基础,还需要好奇心、想象力,以及挑战权威的勇气。”

科学人不要太功利太浮躁

虽然一直崇尚“老实人要做老实事”,“要有坐冷板凳和把板凳坐穿”的决心。但周忠和至今难免被人问起一个问题:研究古生物学究竟有什么用?

他会开着玩笑说,“如果我当初考上了第一志愿化学系,可能合成药物什么的更实用”。

其实,古生物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科学,除了能够撰写生命史书,回答人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基本问题外,还会对宣扬达尔文进化论、预测未来环境变化对人类和生物的影响、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实,问这个学科有没有用,本身就有些功利。自然科学人类探索自然本质的基础科学,同样的,所有基础科学的发展都不是面向当前实际的,很多时候就是人类最原始的好奇心使然。人类很早就怀揣像鸟一样飞翔的梦想,直到近代才产生了飞机、火箭、宇宙飞船,要知道,人类能飞上天、能踏上月球、能探秘火星,是无数个基础科学不断发展的智慧结晶。”周忠和认真地分析说。

古生物学这个门类虽然在“满足国家需求”这一项课题计划上很“无语”,但它确实又为中国人国际学术上挣了“面子”。近年来,我国在古

鱼类、两栖类、恐龙类、翼龙类、海生爬行类、古鸟类学和古哺乳动物及地层学,以及古人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周忠和用“井喷”来形容近20年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态势。他的同事,因“二连巨盗龙”声震世界古生物学界的徐星说,“这得益于前辈留下来的淡泊名利传统,以及周所长为研究团队营造的世外桃源。不功利、不浮躁,才有今天厚积薄发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1929年成立于北京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多年来,相继产生了杨钟健、裴文中、吴汝康、周明镇、贾兰坡、张弥曼、吴新智、邱占祥等杰出学者。

周忠和说:“我们学风好,都是老实人,都在做老实事。我个人真的没什么,团队里有好多人都比我厉害。”他如数家珍——徐星、王元青、张福成、汪筱林、王原等课题组中的一批中青年人才已成为各分支领域的中坚力量。

说这话,会议室门口走过一个年轻的研究员,眼神平和、表情淡然,后背上挂着一个有些陈旧但相当实用的帆布双肩背包……

启蒙科学思维比普及知识更重要

“说起来,达尔文还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进化理论在古生物学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不管鸟类是否由恐龙进化而来,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是帮助人类认识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球,进而对地球上存在过的生命和自然产生足够的敬畏。”

认真思考过科普责任的周忠和,在面对公众表现出的对史前地球的浓厚兴趣时,真诚地提出,“对公众科学思维的启蒙和教育,有时候比仅仅普及科学知识本身更重要”。

拿古生物研究来说,犹如管中窥豹,见一斑而知全部,联想能力和推理能力缺一不可——既要能从现有的不完整的化石中抽丝剥茧、读出过往时空留给现代人的信息,还要有能力把这些信息通过各种假说串联起来、还原出来并验证它们。

每天与冰冷的石头打交道,周忠和从不觉得

枯燥:“这些化石会‘说话’,里面包含着很多信息,告诉我们地球生物的演化历史、地球环境的变化。可以说,我们古生物学家是在撰写几十亿年的生命史书。”

“同样地,基础科学就是把人类最原始的各种好奇心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每个问号都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从过去到未来,从牵引到后果,从主干到分支,知识无尽,乐趣无穷。”周忠和沉思道,“或许这就是基础科学的魅力所在。而真正能沉得住气、把问题追到底的人,首先一定是具有科学思维能力的人。这一点,我觉得毋庸置疑。”

可以肯定的是,古鸟类的“伯乐”周忠和,还将致力于发现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做个人才“伯乐”。

周忠和深陷在沙发中,眯起一双慧眼,由衷地对这项事业感到“非常享受”。

甩掉框框扎扎实实做学问

就在记者为初次见面做深呼吸时,推门迎面扑来的是一个巨大的水墨画般的剪影,层层叠叠的书籍和学术刊物,堆满了书桌和沙发,用“文山书海”形容周忠和的办公桌,丝毫不为过。

紧接着,从桌子后面绕出来握手的,也是一个高壮的剪影,一路带我们走过充满书卷气味的走廊,来到小会议室,才看到周忠和充满童心童趣的灵动眼神。

直言快语的周忠和很谦虚,“我个人的经历就不要讲了,还是要多看看未来。”实际上,能取得今天的非凡成就,还真得从他看似平凡的学术生涯说起。

1982年,周忠和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之后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地质学部研究古鸟类,1990年毕业后进入古脊椎所参加辽西科考,在波罗赤的一条小山沟里,他发现了一块鱼类化石,属白鲟科,是现代长江白鲟的最早祖先。这让他很兴奋。

科考结束后,当其他人沉浸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精彩纷呈时,周忠和独自一人兜兜转转,再次来到那条小山沟,竟意外发现了两块保存相当完整的鸟类化石。带回北京后,专家仔细研究得出结论,化石距今有1.2亿年左右,而这一时期的鸟类化石在全世界都很稀少。

命运的转折来的如此突然,又如此必然。用媒体的话说,周忠和从此“弃”鱼“从”鸟,专攻古鸟类。

1992年,他与同事为辽西发现的鸟类化石命名为“燕都华夏鸟”。经分析,这是一种反鸟,其某些骨骼特征与现在的鸟类相反。同年,周忠和在国际古鸟类学术会议上报告了他的发现,与会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空白。

周忠和回忆说:“我的运气比较好,刚刚硕士毕业就发现了重要的鸟类化石。”周忠和的“运气”一发不可收拾,在随后几年里,周忠和与他的

■亮相

文·马意翀

他出生于湖北农家,怀着让农民富起来的朴素愿望,在棉花研究领域一干就是30多年;他先后主持培育20个短季棉新品种,创新国产抗虫棉自主品种并为优质棉育种奠定基础。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棉花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喻树迅。

“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就是要做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是要为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培育优良的作物品种就是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一条途径。”喻树迅在长达30多年的棉花育种科研生涯中,一直坚守这样的信念,奋斗并履行着这份责任。

喻树迅1953年出生于湖北麻城,从小参加生产队棉花生产,对棉花生产的繁重劳动深有感受。1979年从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遗传育种专

喻树迅:守望棉田三十载

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从事棉花遗传育种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棉花生长期长,我国北方只能种一季棉花,加上人多地少,粮棉争地矛盾日益突出,棉农盼望一季春棉变两季。针对当时生产需求及黑山棉1号生育期长、不抗病等重大问题,在刁光中先生的带领下,喻树迅和大家一起进行短季棉育种攻关,相继选育出早熟性好,生育期较短,适合麦棉两熟的早熟新品种中棉所10号和中棉所14.16等,缓解了粮棉争地矛盾,掀起了黄河流域棉区耕作制度改革的高潮,成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麦(油)棉两熟栽培的主要短季棉品种,使我国短季棉抗病育种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世纪90年代,我国棉区棉铃虫大暴发,每年造成经济损失100亿元以上。喻树

迅和他的研究团队迎难而上,通过主持棉花转基因专项,建立上、中、下游合作机制,利用合作单位抗虫基因,研发出作为模式化转化受体的中棉所24,大大提高了转化效率,为形成年产转基因棉株8000株的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喻树迅主持培育中早熟抗虫棉中棉所45,该品种生育期128天,为国家套种棉区对照品种。麦棉套种的高产、优质、多抗新品种中棉所45、中棉所35选育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近年来,他又主持培育短季转基因抗虫棉品种6个。其中,中棉所50霜前皮棉比对照增产29.4%,为河南省早熟区对照品种,目前已成为冀鲁豫短季棉主推品种。

喻树迅先后主持了两项国家973计划项目,根据我国棉花产业对优质纤维的需要,组织协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开展棉花纤维品质基础研究工作。该项目中期评估和结题验收均为优秀,并进入973“十一五”重大成果展。

喻树迅几乎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了作物育种工作上。儿子出生那天,作为丈夫和父亲没能守候在妻子和孩子身边。由于工作繁忙,从事棉花研究30多年来,喻树迅回老家探亲的次数屈指可数,就连父亲和母亲去世时未能尽孝……

2007年,在他的带领下,首次启动了我国棉花基因组测序计划。2014年4月,亚洲棉(A基因组)全基因组测序组装全部完成,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 Genetics。该研究为我国在世界棉花基因组研究方面取得先机,达到了国际领先地位。

(新华社)